

文本与史实*

——明清时期潞安府地方志堡寨记载稀少的原因与真相管窥

郝文军

提 要：战乱时期修筑堡寨以自卫是上党乡村百姓的传统。明代潞安府多次遭遇大的动乱，按逻辑应该修筑许多堡寨聚落。目前在原潞安府境内乡村堡寨遗迹稀少，地方志等文献对于当地堡寨情况也疏于记载，似乎明代当地并没有因应对动乱而大量修筑堡寨。文本的记载是真实地反映了当地没有大量修筑堡寨的史实，还是另有原因？通过综合分析发现，地方志等文献关于当地堡寨的稀疏记载并没有真实反映历史事实。明代潞安府乡村曾多次大规模修筑堡寨，明清时期地方志文献中堡寨记载缺失，表面原因是方志修撰时，堡寨已经所剩无多；深层原因则可能是修撰者基于当地百姓对修筑堡寨的抵触情绪和不想给地方百姓带来修筑负担的考虑而有意不予记载。

关键词：明清时期 潞安府 堡寨聚落 文本 史实

根据文本文献探究史实是历史学的传统。不过因为历史文本容易佚失，文本修撰者的疏漏或曲笔撰述等，有时文本未必真实地反映史实，而需要借助其他方法或手段予以修正。战乱时期修筑堡寨以自卫是上党地区乡村百姓的传统。明代潞安府（古上党地区）多次遭遇大的动乱，也多次大规模修筑堡寨聚落。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明清时期潞安府及其属县撰修地方志对境内修筑堡寨情况记载很少，而且语焉不详。此外，目前在原潞安府境内乡村堡寨遗迹与毗邻区域相比也十分稀少。这一现象引起笔者兴趣，遂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修筑堡寨的传统与屡遭战乱的社会环境

明代潞安府古称上党，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先秦到宋元，每遇兵戈，当地乡村百姓通常会自发地修筑堡寨以自卫，并逐渐形成地方传统，相关记载不绝于史。先秦时期乡村堡寨称作“城”或“保”（通“堡”）。上党地区在战国时期为韩、赵、秦三国争夺要地，历史上许多知名战役就发生在这一地区，文献中多以“拔*城”形式记载。如《史记·秦本纪》记载：“四十三年，武安君白起攻韩，拔九城……四十五年，五大夫贲攻韩，取十城。”这里的“城”，不少可能就是当时乡村百姓战乱时修筑的堡寨聚落。此后，每遇战乱，当地乡村聚落常修筑堡寨以自卫。明弘治年间马墩纂修的《潞州志》记载金末元初当地人任尚志：“岁戊寅，太师国王木华黎略地至潞州，志首逆降，国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帅，收辑山寨。数与金兵战，有功。”^①其中“收辑山寨”一句说明当时潞州一些乡村是筑有堡寨的。《明实录》中记述明初朱元璋军队在晋东南攻打元朝军队时，也透露不少乡村当时为堡寨聚落的信息。“丙辰，官军攻太行山玲珑等四寨，拔之。明日，又攻破牛心寨，擒元佥院陈天佑等一十九人，斩之。”^②“右副将军冯宗异、偏将军汤和取潞州。大将军徐达遣指挥叶某等取齐堂山寨。”^③明清方志中有时也透漏当地一些古代堡寨聚落信息，多散见于

* 本文为渤海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明清晋东南乡村堡寨聚落研究”（项目编号：0516bs016）阶段性成果。

① 马墩纂修：《潞州志》卷10《壶关县·流寓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482页。

② 《明太祖实录》卷33，洪武元年（1368）闰七月丙辰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③ 《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九月丁丑条。

古迹、关隘、武备等目下，有时也隐藏在山川、艺文等目下。如乾隆《潞安府志》在“古迹”下记载的“高望堡”就是隋末唐初当地修筑的一处乡村堡垒，唐武德四年（621）还曾在此置壶关县治。另外，明清时期当地基层乡村聚落中许多以堡、寨、砦、壁等命名的村落，有学者研究认为，这其中许多村落在历史时期曾经作为堡垒聚落存在。^① 上述信息都说明：历史上，上党地区乡村聚落有战乱时修筑堡垒自卫的传统。

明代潞安府境内乡村聚落也有修筑堡垒的社会背景。有明一代，潞安府境内多次遭遇战争之灾，影响较大的就有4次。按照时间先后依次为正德六年（1511）杨虎起义军过境山西，嘉靖初年潞州陈卿发动“青羊之变”，嘉靖时期蒙古俺答汗军队入侵和明末陕西农民起义军的盘踞攻占。上述战争灾乱都给当地城乡造成巨大破坏。如正德六年六月，刘六、刘七起义军的西路军在杨虎等率领下从河南过境山西南部，然后从山西越过太行山回到河北平原。虽然起义军属于过境行军，总计在山西停留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沿途州县城乡仍受较大影响，“泽、潞、辽诸州，陵川、壶关、高平、沁水、阳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赵城、灵石、介休、平遥、祁、太谷诸县，皆残破杀掠以千万计”^②。潞州的雄山乡和属县壶关县南部乡村惨遭焚掠。嘉靖初年潞州又发生“青羊之变”。因为起义发生在潞州本地，核心活动区域为潞州及其所属各县，起义军与官府军队在潞州的城乡反复厮杀争夺又长达7年时间，所以这次战乱对当地乡村聚落的破坏更严重、更深远。嘉靖中后期、崇祯时期，潞安府又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前者是因为漠北草原的蒙古俺答汗军队的南下骚扰劫掠，后者是因为陕北农民起义军的战事。这两次动乱，对明代潞安府乡村的破坏与“青羊之变”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可见，正德以后，潞安府境内战乱不断。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战乱时期修筑堡垒传统的潞安府，境内乡村在明代理该多次修筑堡垒。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史书文献又是怎样记载的呢？

二 集中修筑堡垒的表述与地方志疏于记载的现象

根据现存文献，至少能确定明代潞安府境内乡村曾有两处集中、大规模修筑堡垒行为，对应嘉靖后期蒙古军队南侵进入潞安府境内和崇祯时期陕西农民军在晋东南的战争事件。

嘉靖时期是山西境内州县遭受北方蒙古军队侵袭最为频繁、激烈，损失最为严重的时期，也是蒙古军队首次进入潞安府境内给当地城乡聚落造成巨大破坏时期。检阅山西省明清时期纂修的地方志，会发现山西腹地州县乡村集中大规模修筑堡垒是在嘉靖十九年（1540）以后，涉及范围从北向南覆盖大同府、太原府、平阳府、汾州、沁州、辽州和潞安府等，与这一时期蒙古军队频繁侵入和影响范围相一致，说明两者密切关联。在边镇军队无力保境安民的背景下，官府不得不倡议地方百姓通过修筑堡垒以御敌自保。嘉靖十九年，就在俺答汗军队长驱直入岢岚州，官军无力阻挡时，“巡抚陈公檄下郡邑俾各修城堡防护”。面对威胁，当时许多州县官民都积极行动，修堡垒筑寨。但也有的州县百姓不以为然，“皆云：百岁之老，未闻有此督责。虽严，恬不为意”。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军队“由天城径趋三关，总帅丁谨率众御之，全军败没。关门不守，直抵山西省城……平定而东，石州而西，祁县、文水而南，杀伤男妇二十余万，牲畜未算”，“全晋震惊”^③。遭劫后，为防止蒙古军队再次来袭，大多数州县，包括没有遭到蒙古军队侵扰的州县（如曲沃县等）也积极修筑民堡，防止遭遇不测。^④ 清代康基田编著的《晋乘搜略》也记载

① 参见王绚：《传统堡垒聚落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3—165页。

② 《明武宗实录》卷86，正德七年（1512）四月戊寅条，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本，1962年。

③ 以上引文见王嘉谟修康熙《徐沟县志》卷4《艺文》收入的明朝高汝行撰写的《徐沟县新筑北关城碑记》，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本。

④ 参见刘鲁主修、李廷宾纂：嘉靖《曲沃县志》卷1《都鄙志·城池》，明嘉靖三十年（1551）刻本。

了明嘉靖十九年以后,山西腹地州县的乡村为抵御蒙古军队侵扰集中修筑堡寨的情况:“乃若腹裹,故无土堡,自庚子辛丑,敌势鸱张,残贼内地,于是各修堡以备之,而因地团聚,为制不一云。”^①文中“庚子”“辛丑”分别对应嘉靖十九年和嘉靖二十年(1541),正是俺答汗军队攻击山西腹地州县最为激烈和深入的时期。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军队再次南侵,“掠沁、汾、襄垣、长子”,给沿途乡村聚落造成巨大人员和财产损失。万历《沁源县志》记载“杀掠人畜殆尽”。康熙《直隶沁州志》记载:“男妇伤残被掠者甚众,掠牛羊财富以数万计。”此后,俺答汗仍多次南下侵入山西腹地,逼近潞安府境内各县。隆庆元年(1567),俺答汗军队曾再次南侵至潞安府近邻沁州,“至郭道镇而还,是年石州陷”^②。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潞安府境内乡村聚落在蒙古军队不断南侵的威胁下,为了自保,积极响应官府的倡议,掀起一次大规模修筑堡寨的行动。顺治《潞安府志》中有一段文字记述了当时情况:“嘉靖间,边患孔棘,各县乃于民居繁衍村落督建城堡以保卫民。群雉云连,崇墉棋布……”^③文中的“边患孔棘”指的就是蒙古俺答汗军队的频繁南侵,“群雉云连,崇墉棋布”则说明乡村堡寨聚落规模宏大,数量众多。

天启以后,明朝进入末世,军备废弛,官场腐败,灾害频发,官府救灾不力还对人民极尽搜刮,全国各地民怨沸腾。崇祯时期,发生大灾荒的陕北农民首先起义,并迅速向周边蔓延。山西与陕西一河之隔,成为陕西起义军最先攻入的地区。因为山西也爆发了大灾荒,所以起义军所到之处,灾民纷纷加入,队伍迅速壮大。起义军主体是饥民,起义的最初目的就是求生存,获取粮食和财富是其主要特征之一,于是生活于城乡的皇族、官宦、士绅地主、商人成为起义军的主要攻击对象。明代潞安府和泽州地区官贾云集、经济富庶,又地处北上太原、南下中原、东抵京师的咽喉要道,成为起义军长期驻扎和反复攻击之区。因此,明末战乱对潞安府和泽州城乡聚落的破坏更甚于其他地区。如潞安府的《黎城县志》记载:“崇祯五年腊月,流贼邢红狼破辽州,黎土震惊,寻即至南北陌、东西井,放火焚掠,杀人如麻……六年、七年,流寇邢红狼、老回回、八大王、紫金梁,俱环黎境,大肆杀掠,山殷沃皆为废墟,孤城危如累卵。”^④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潞安府境内乡村再一次掀起修筑堡寨的高潮,对此,顺治《潞安府志》记载:“天崇而后,海内多事……日罹于兵燹……于是百姓知堡之不足恃……宁拼力以筑砦,有事则各窜分逃,而不肯修堡以守望相助也。”^⑤文中的“海内多事”指的是明末爆发的多次农民起义,而“日罹于兵燹……于是百姓知堡之不足恃……宁拼力以筑砦”则反映了原来土堡经不起农民起义军攻击,百姓转而修筑更坚固的砖寨的情况。直到现在,长治市境内的一些村庄还保存一批明末为躲避战乱修筑的避兵楼,就是前文中所说的“砦”。这些避兵楼都是砖石结构的单体高层建筑,易守难攻,比夯土结构的土堡更坚固。顺治《潞安府志》的这段记载说明,明末潞安府境内乡村也曾大规模修筑堡寨,但以砖石结构的砦更为普遍。

顺治《潞安府志》只记载了嘉靖后期和崇祯时期境内乡村修筑堡寨的情况,对应嘉靖后期蒙古军队的入侵劫掠和明末农民起义军在泽路地区的战事。而对正德六年(1511)杨虎军队过境山西和嘉靖初年陈卿发动的“青羊之变”是否也曾促使潞州(嘉靖八年〈1529〉以后升为潞安府)境内乡村大规模修筑堡寨,现存明清潞安府及属县的方志文献都没有明确记载,需要综合其他因素进行论证。

① 康基田编著:《晋乘搜略》卷30上,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20页。

② 汪宗鲁纂修:康熙《山西直隶沁州志》卷1《天文考·灾异附》,清康熙十三年(1674)刻本。

③ 杨峻编修:顺治《潞安府志》卷6《城池》,清顺治十六年(1659)刻本。

④ 程大夏纂修:康熙《黎城县志》卷2《政事志·纪事四》,康熙二十一年刻本。

⑤ 杨峻编修:顺治《潞安府志》卷6《城池》。

笔者认为,正德六年杨虎军队过境山西没有导致潞安府境内乡村修筑堡寨。虽然起义军对山西泽、潞、辽诸州,陵川、壶关和祁、太谷等10多个县的城乡冲击很大,但是因为是流动作战,“倏忽来去,势如风雨”^①,在每个州县经停时间短暂,而且过境山西后没再回来,据此推测山西境内受冲击的各州县(包括潞州各县)在当时没有修筑堡寨聚落。一是事起突然,时间仓促。起义军突然从河南进入山西,然后一路北上东移,沿途乡村来不及修筑堡寨。二是起义军只是借道山西,离开后没再回来,没有修筑堡寨必要。万历时期修撰的《泽州志》记载:“正德末,霸州贼赵鏃、刘六、刘七、杨寡妇等流劫中原,分寇阳城东白巷等处,民以铁器排衢,瓦石击御,贼度不能,遂退。”^②说明当时阳城县白巷里等村在当时没有修筑堡寨,而是用铁器堵塞街巷,然后通过投掷瓦石击退起义军。潞安府现存明清地方志及相关文献,未发现正德年间境内乡村修筑堡寨的任何记载,也印证了笔者的推测。

嘉靖初年发生在潞州的“青羊之变”应该催生了一批乡村堡寨聚落。笔者这样判断的根据是:起义爆发于潞州境内,而且坚持斗争长达7年时间。战乱期间,潞州及其属县城乡聚落多数被起义军攻占,官军和起义军对一些聚落进行反复争夺厮杀。“青羊之变”对潞州的影响时间久、范围大,城乡聚落的破坏程度也更深。康熙《平顺县志》收录的《创建平顺县记》记载起义军曾“御行旅,掠村堡,焚荡屋宇”。夏言《勘青羊山平贼功次以明赏罚疏》也记载起义军有“焚民居,掠锦帛子女”。虽然上述记载有将破坏城乡聚落的责任都推给起义军之嫌,但也印证了战乱对境内城乡聚落的巨大破坏。这种情况下,无险可守的乡村百姓只能借助堡寨以避兵灾。相关文献也证明这一点。长治县的北董堡、苏店堡等堡寨据称就是这一时期修筑的。^③介于沁州和潞安府屯留县的余吾古镇,地处潞安府通往沁州的交通要道,当时为了阻遏起义军入境,也修筑了堡寨。^④潞安府现存地方志中对境内修筑堡寨情况记载很少,其中能证明是嘉靖初年应对战乱威胁的仅上述3处堡寨。但考虑到起义持续的时间、影响的范围和对乡村聚落的巨大破坏,推测当时境内有实力的较大聚落多数应该有修筑堡寨抵御战乱的行为,只是囿于文献记载缺失而无法确定具体数量。也就是说,嘉靖时期潞安府境内乡村聚落曾经有两次修筑堡寨聚落的行为。一次是嘉靖初年为抵御陈卿农民起义军进攻而修筑的,如余吾堡、北董堡、苏店堡等。一次是嘉靖年间(集中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前后)蒙古俺答军队进攻山西最为猛烈时期为抵御蒙古军队劫掠而修筑的,如龙川寨、霜泽寨、中村寨等(参见后面论证)。嘉靖初年为抵御陈卿军修筑的堡寨也在此后蒙古俺答汗军队入侵时经维修巩固继续发挥御暴安民的作用。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明代正德以后,潞安府境内乡村至少应有3次大规模修筑堡寨的行为。

明清时期潞安府及其属县修撰几十部方志,现在保留下来的有22部。既然明代潞安府境内发生4次大的战乱,曾3次大规模修筑乡村堡寨聚落,按理说在地方之中应该有详细记载才对(与潞安府毗邻的沁州和泽州的地方志是这样的)。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这22部地方之中,除顺治《潞安府志》中有一段笼统记载境内两次大规模修筑堡寨的文字外,余者对境内堡寨修筑的具体记载十分稀少,明确指出是建于明代的更是凤毛麟角。具体情况见表1。

① 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45《平河北盗》,中华书局,1977年,第667页。

② 傅淑训重修,郑际明续修:万历《泽州志》卷15《灾祥》,明万历刻本。

③ 参见李桢撰:《长治县志》卷3《城池》(清光绪二十年〈1894〉刊本)收录清康熙时期当地人李中白和申宏谟为北董堡、苏店堡重修作记,二人分别根据里老传说和堡寨匾额,推测北董堡、苏店堡为嘉靖初年为防御陈卿起义军修筑的。

④ 参见康基田编著:《晋乘搜略》卷30上,第2290页,记载“平顺之变,邻壤警备,沁州筑堡于余吾城”,说明屯留县的余吾堡是明嘉靖初年沁州为防御陈卿农民军进入境内修筑的。

表 1 明清时期潞安府及其属县地方志有关境内堡寨记载情况一览表

序号	志书名称	修撰时间	堡寨记录	修筑时间
1	《潞州志》	明弘治时期	无	
2	《潞安府志》	明万历时期	无	
3	《潞安府志》	清顺治时期	有一段记载境内两次大规模修筑堡寨情况，但没记载具体堡寨信息	嘉靖时期 崇祯时期
4	《潞安府志》	清乾隆三十五年 (1770)	无	
5	《潞城县志》	明万历时期	无	
6	《潞城县志》	清康熙四十五年 (1706)	无	
7	《潞城县志》	清 光 绪 十 年 (1884)	无	
8	《黎城县志》	清康熙二十一年	西仵堡、古关堡、松池山寨、九龙山寨（分记在天津、古迹目下）	未注明
9	《黎城县续志》	光绪九年	无	
10	《壶关县志》	康熙二十年	崇贤堡、辛村寨、好劳寨	未注明
11	《壶关县志》	乾隆三十五年	崇贤堡、辛村寨、好劳寨（俱废）	未注明
12	《壶关县续志》	光绪七年	无	
13	《平顺县志》	康熙三十二年	无	
14	《屯留县志》	康熙十四年	余吾堡、丰仪堡、霜泽寨、中村寨	未注明
15	《屯留县志》	雍正年间	无	
16	《重修襄垣县志》	康熙年间	龙川寨	嘉靖二十年建， 隆庆二年重修
17	《重修襄垣县志》	乾隆四十七年	隆川寨	嘉靖二十年建， 隆庆二年重修
18	《长治县志》	康熙十二年	北董堡、苏店堡、南董堡、角沿村堡（废）、关村堡、西火堡（废）	未注明
19	《长治县志》	乾隆时期	北董堡、苏店堡、南董堡、角沿村堡（废）、关村堡、西火堡（废）	未注明
20	《长治县志》	光绪二十年	北董堡、苏店堡、南董堡、开村堡	北董、苏店堡修于明嘉靖时期
21	《长子县志》	康熙四十四年	无	
22	《长子县志》	乾隆四十三年	无	

表 1 所列的 22 部地方志中，有 10 部记载了境内乡村修筑堡寨情况，剩下 12 部则没有记载。按照地方志修撰的朝代看，明代修撰的 3 部地方志都没有记载境内的堡寨修筑情况；清代修撰的 19 部地方之中有 10 部地方志记载了境内修筑的堡寨情况，其中注明是明代修筑的仅 3 座，剩下的没有注明修筑时间。按照政区看，潞安府所属各县中，只有潞城县、平顺县和长子县没有堡寨记载，其他各县或多或少都有堡寨记载，而 5 个县记载的堡寨聚落总计只有 18 座，数量极其有限。这难免让

人产生疑问：明代潞安府境内乡村聚落是否真的如顺治《潞安府志》记载的那样曾大规模修筑过堡垒？如果明代潞安府境内乡村确实曾多次大规模修筑堡垒，什么原因导致地方志记载稀少？上述问题，学界还没有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尝试通过挖掘新史料、综合分析等方法予以解答。

三 堡垒修筑的考实与地方志未予记载的原因分析

明朝潞安府境内乡村聚落是否曾大规模修筑堡垒？笔者认为这是肯定的。依据之一，潞安府境内乡村自古有战乱时修筑堡垒以御敌自卫的传统，而正德以后潞安府境内先后遭遇了4次大的军事冲击，每次都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有修筑堡垒的社会环境。依据之二，潞安府境内主要乡村的地貌特点决定其在战乱时只能依靠修筑堡垒来保卫自己。潞安府境内有晋东南最大的盆地——长治盆地，又称上党高原。长治盆地土地肥沃、水资丰富、耕地连片，是潞安府境内大聚落的主要集中区域。因为地势平衍，无险可守，处于盆地上的乡村聚落在战乱时期只有通过修筑堡垒才能自保。这正是顺治《潞安府志》记载嘉靖时期蒙古军队南侵和崇祯时期陕西农民起义军占据潞安府时，官府倡议地方士绅带头修筑堡垒以自保的原因。依据之三，现存文献的笼统或零星记载也说明，战乱时期，潞安府境内乡村是有修筑堡垒的行为的。前面列举顺治《潞安府志》的记载为笼统记载，而零星记载则散见于其他明清地方志等文献。康熙年间修撰的《重修襄垣县志》记载境内下良镇下有一座堡垒：“今镇有龙川寨，嘉靖二十年建，隆庆二年重修，皆本镇李绛、李绛、李缮等各出粟犒工而成之。”^① 龙川寨建造和重修时间，正是蒙古俺答汗军队进攻山西最激烈，多次逼近甚至侵入潞安府的时期。因此，龙川寨应该是当时当地村民为抵御蒙古军队侵扰而修筑的。这说明，潞安府境内修筑防御蒙古军队的堡垒，至少在嘉靖二十年俺答汗军队还未侵入潞安府境内就开始了。清嘉庆年间修撰的《大清一统志》也记载一些潞安府所属各县乡村聚落修筑堡垒情况：“余吾故城，在屯留县西……明嘉靖间筑堡，城周二里……下良镇，在襄垣县北三十里。镇有龙山寨，明嘉靖中建……霜泽寨，在屯留县西五十里，一名双泽寨……有中村寨，在县西一百里，界沁源县界，俱明嘉靖十一年筑……北董堡，在长治县东南十里，土城，周四里，高一丈八尺，明嘉靖中筑。”^② 文中的龙山寨为龙川寨之讹，前文已论证其修筑与当时蒙古军队侵入山西腹地密切相关。霜泽寨和中村寨，文中标注是明嘉靖十一年（1532）修筑，但笔者推测“嘉靖十一年”应该是“嘉靖二十一年”的讹写。因为嘉靖十一年距陈卿起义被镇压下去已经4年，距蒙古俺答汗军队入侵潞安府还有10年，在没有军事威胁情况下，当地居民是不会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修筑堡垒的。而嘉靖二十一年正是蒙古俺答汗军队大举侵入潞安府境内，造成人员大量伤亡的时期，霜泽寨和中村寨应该是当时境内百姓为抵御蒙古军队入侵而修筑的众多堡垒之二。光绪《长治县志》引述清康熙初年当地人李中白、申宏谟为重修北董堡、苏店堡题记，推定北董堡、苏店堡修于明代嘉靖时期，也侧面印证了嘉庆《大清一统志》中的记载。这样，在上述列举的18座堡垒中，能明确为明代修筑的增加到6座。而根据表1所列22部地方志中所记载的18座堡垒在清初还保存较好推测，这些堡垒多数在明末抵御农民军进攻中应发挥着作用。这也就是说，这18座堡垒都应该是明朝某一时期的堡垒。由此推定，明朝潞安府境内乡村聚落的确曾大规模修筑过堡垒。只是因为顺治《潞安府志》只有宏观记述，其他地方志中又记载稀少，目前无法确定明代潞安府境内乡村到底曾修筑过多少座堡垒。

既然明代潞安府境内乡村确曾多次大规模修筑堡垒，为什么明清地方志中或者未予记载，或

① 袁良修：康熙《重修襄垣县志》卷1《輿地志·里镇市集附》，清康熙四十五（1706）年刻本。

② 穆彰阿等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142《潞安府·古迹、关隘附》，清道光年间刻本。

者记载稀少，原因是什么？如前所述，明清时期潞安府及其属县修撰的地方志达数十部，仅现存就有 22 部。排除重复记载，22 部地方志中记载的堡寨数量仅有 18 座。其中，能明确为明朝修筑的只有 6 座，其他的推测多数在崇祯时期已经存在。但即便上述 18 座堡寨均为明代修筑，对于下辖 8 个县上千个乡村聚落的潞安府而言，如此少的堡寨也是不正常的。明代，沁州和泽州与潞安府互为犄角，地理单元上同属晋东南，境内社会环境与潞安府类似，而其现存地方志中记载的堡寨数量与潞安府相比则多得多。沁州现存明清地方志近 10 部，排除重合部分，记载境内修筑堡寨聚落达 64 座，其中仅沁源一县能明确为明朝修筑的堡寨就达 16 座（见表 2），剩下的 38 座堡寨经推测也多数在明末就存在。^① 泽州因为位于山西最东南角，在明朝没有受到蒙古军队侵扰，但即便这样，地方志中记载的堡寨聚落排除重合部分也达 44 座，其中能明确为明朝修筑的堡寨达 14 座（见表 3）。根据地方志记载的堡寨计算平均每个县修筑堡寨数量，沁州为 21.3 个，泽州为 8.8 个，而潞安府仅为 2.3 个。无论从具体数量上，还是从比例上看，潞安府境内乡村修筑堡寨的记载都远低于沁州和泽州。如果再比较沁州、泽州、潞安府的地貌特点和拥有大村数量情况会发现，明清潞安府及其属县记载的堡寨数量是十分不正常的。

表 2 明清时期沁州及其属县地方志有关堡寨记载情况一览表

志书名称	修撰时间	堡寨数量	修筑时间
《沁源县志》	明万历时期	16 座	未注明
《沁源县志》	清雍正八年（1730）	23 座	保安寨注明为明崇祯五年（1632）知县修筑，其他的未注明
《山西直隶沁州志》	康熙十三年（1674）	18 座	未注明
《沁州志》	雍正九年	沁州 33 座、沁源县 23 座、武乡县 8 座，合计 64 座	未注明
《沁州志》	乾隆三十六（1771）年	同雍正《沁州志》，64 座	未注明
《武乡县志》	康熙三十一年	无记载	
《武乡县志》	乾隆五十五年	21 座	未注明

说明：这里主要列举明代和清初修纂的地方志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明清时期潞安府及其属县地方志记载境内堡寨数量如此稀少呢？笔者检索现存明清地方志文献、时人文集以及当地乡村现存的明清碑刻文献，都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线索。目前只有顺治《潞安府志》在记载境内两次大规模修筑堡寨之后，附在后面的几句话透露出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可以管窥明清潞安府地方志很少记载境内堡寨的原因。

顺治《潞安府志》记载嘉靖时期境内为防御蒙古军队入侵，“各县于民居繁衍村落督建城堡，以保卫民。群雄云连，崇墉棋布，似亦足恃以无恐”。紧接着附上这样一段话：“未几而吏缘为奸，索瘢擢发，设为不可结之局，以难居民而要厚实。叫嚣冲突，日夕不休。民怒不敢言，

① 参见郝文军《明清时期晋东南堡寨聚落地理研究》对明末堡寨数量的分析，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 年，第 105—132 页。

表 3 明清时期泽州（府）及其属县地方志有关堡垒记载情况一览表

志书名称	修撰时间	堡垒数量	修筑时间
《泽州志》	明万历时期	无记载	
《泽州志》	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无记载	
《泽州府志》	雍正十三年（1735）	高平县 8 堡，阳城 13 座堡	未注明
《高平县志》	顺治十五年（1658）	10 座堡	未注明
《陵川县志》	康熙十三年	7 座堡垒	未注明
《陵川县志》	乾隆五年（1740）	无记载	
《陵川县志》	乾隆四十四年	7 座堡垒	未注明
《沁水县志》	康熙三十六年	14 座	明崇祯初年
《阳城县志》	康熙时期	11 座堡	未注明

说明：这里主要列举明代和清初修纂的地方志

于是告并行废，当道亦悉其莫可谁何之情而亟准之。民惟恐其坏之不速，而貽复举之患也，相与堕其墉，夷其基而后快矣。其心更不念异日虏患之再棘矣。是岂愚无远虑哉？切于近忧故也。夫城以卫民，而乃益其祸，穴之足以穿其墉也。盖如此，今虽有废雉数区，亦不敢录。”^①这段话说明，在明嘉靖时期，潞安府各县乡村为抵御蒙古军队的侵袭，由官府派胥吏监督士绅百姓，在“民居繁衍村落”修筑了规模宏大、数量众多的堡垒。但是此后地方不良胥吏却将此作为盘剥地方百姓，从中获利的手段，不断地逼迫地方百姓维修堡垒。对堡垒质量吹毛求疵，迫使地方百姓贿赂胥吏。文中记述“前朝载，人查盘，寸瑕必罚。追呼络绎者，虽鸡犬不得宁焉”，而“告废后，则无是矣”。因此，地方民众对修筑堡垒行为深恶痛绝，并通过瞒报或彻底毁坏堡垒来逃避修筑堡垒的负担。地方当政者知晓百姓遭遇，对胥吏舞弊又无能为力，所以对百姓瞒报或毁坏堡垒行为也就不加点击。百姓担心这些堡垒不彻底毁坏，会给自己留下再次维修的负担，所以“相与堕其墉，夷其基而后快”，将许多堡垒彻底拆除。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潞安府志关隘”条目下也抄录一段与顺治《潞安府志》关于堡垒记载十分相似的文字，并指出因为不良胥吏恶行，造成原本修堡卫民的好事变成增加百姓祸患的坏事。根据上下文推断，这应该是万历《潞安府志》未记载境内堡垒聚落的重要原因。

明末崇祯时期，山西的泽潞地区一直是农民起义军和明朝军队反复冲杀的核心区，因此潞安府境内的乡村也是遭受军队破坏最为严重的区域。在这一背景下，潞安府境内乡村百姓再次修筑堡垒以自卫。但是因为农民军善于攻城，原来的土堡大多经不起农民军的攻击而毁坏。即便像北董堡、苏店堡这样堡堞坚固的大城堡，也在农民起义军的突然袭击中“故家大贾，荡析煨烬，殆矣”。另外，顺治五年（1648）大同姜瓖反清，潞安府所属各县汉族官绅百姓也积极响应，^②“一府八县，相继沦陷”^③。姜军各自设官委吏，据城守寨，抗击清军。姜军失败后，潞安府的州城、县城和许多乡村堡垒因为抵抗清军遭到屠城毁寨的惩罚。如顺治《潞安府志》卷 15《纪事一》载顺治六年十月十六日，清军攻克潞安府后，“问罪城中及乡镇，诛戮凡数日而止”；康熙《长子县志》卷 1《灾祥·兵革附》也记载，顺治六年十一月初四日清军攻破长子县城后“杀戮惨甚”。明代潞安府境内的乡村堡垒，经历嘉靖以后的自然损毁、百姓破坏以及明末清初陕西农民军和清兵的

① 杨峻编修：顺治《潞安府志》卷 6《城池》。

② 参见姚学瑛修：乾隆《沁州志》（清乾隆三十六（1771）年）卷 9《灾异》载大同姜瓖举义后，“汾、潞、泽、辽等郡邑小丑乘时蜂起，伪帅胡国鼎啸聚潞安，祸连沁属”。

③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顺治八年十月十二日山西巡抚刘弘遇题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年，第 1 册（上），第 158 页。

相继攻伐，已经所剩无几了。据此，笔者以为，顺治《潞安府志》修纂时，笼统记载明代境内曾两次大规模修筑堡寨但不记载具体还剩下哪些堡寨，达到既记载了史实又不给百姓增加修筑堡寨负担的目的。文中“今废堡数区，毕竟尤资捍卫，但民贫无力，版筑维艰耳。所当听民之自为修葺，约限报完，勿令吏后之查督，以滋弊端”^①的记载再次说明，顺治《潞安府志》不具体记载境内残存堡寨的原因是考虑到百姓刚刚从战乱中走出来，生活艰难，无力维修堡寨，所以当政者“听民之自为修葺，约限报完”。因为担心再次出现不良胥吏以督查之名鱼肉百姓的情况而“勿令吏后之查督，以滋弊端”。这段话是撰修者对“今虽有废雉数区亦不敢录”的再次说明。万历《潞安府志》不专门记载境内堡寨，万历《潞城县志》也将村堡混合，不专门记载境内堡寨也都应该是出于同样目的。顺治《潞安府志》、乾隆《潞安府志》和康熙《潞城县志》等不记载境内堡寨则是理解并赞同万历《潞安府志》的考量。

弘治《潞州志》则有所不同，因为当时潞州境内还没有发生大的战乱，没有修筑堡寨，因此，在潞州及其属县的“坊厢镇集（店）”条目下就没有堡寨的记载。此外，地方志修纂时境内保存堡寨已经很少，甚至完全损毁应该是不予记载的另外一个因素。以万历《潞安府志》为例，从隆庆五年明朝与蒙古停战休兵到万历后期《潞安府志》修撰，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双方没再发生战争。没有了战争威胁，当地百姓自然就不再重视堡寨的防御作用，维修的积极性大打折扣，散布乡村的土堡经不起几十年的风吹雨淋，逐渐损毁。而不良胥吏借口修堡对百姓百般盘剥的恶行引起百姓相与堕墉平基而后快的破坏行为，更加快了堡寨崩塌的进程，所以到万历《潞安府志》编撰时，估计已经没有什么堡寨了。同样，清初战争消弭，百姓初安，地方执政者基于休养生息的目的不再强迫百姓维修堡寨。此后康雍乾太平盛世，百姓已经不知战争是啥滋味，自然无意再维修损毁堡寨了。所以，雍正以后修纂的地方志中或者不记载境内堡寨（如光绪《黎城县志》、光绪《壶关县志》等），或者记载了也标注“废弃”字样（如乾隆《壶关县志》、雍正《屯留县志》等）。

结 语

明代潞安府境内乡村聚落仍延续着战乱时期修筑堡寨的传统。明代潞安府境内遭遇了4次大的军事冲击，有3次军事冲击催生了一批乡村堡寨聚落。明清时期潞安府及其属县地方志中很少记载明代境内乡村修筑堡寨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现存堡寨”数量确实稀少的事实，另一方面则如顺治《潞安府志》所述，是基于不给地方民众带来干扰和负担的考量。此外，通过顺治《潞安府志》卷15“国朝纪事”的隐晦记载推断，清初潞安府及其属县地方志对境内堡寨不予记载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一些明代修筑的堡寨在清初因为响应姜瓖举义，失败后遭到清军报复性屠城毁寨。方志的修撰者为尊者讳，不敢记载。正如葛兆光在《中国思想史·导论》中所说：“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档案和史书中，都可能存在‘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②这些“经过筛选、省略、简化”的史料，导致我们在阅读文本探究史实时会不经意间偏离真相。明清潞安府及其属县地方志不予记载境内乡村堡寨的现象提示我们，历史的文本与史实之间有时会存在较大偏差，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而文本与史实的出入，其中则蕴含着丰富的可资探究的内容，这也许正是本文所揭示出来的最具有意义的东西。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 杨俊编修：《潞安府志》卷6《城池》。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7页。